

（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四日出版）

本期目录

【研究报告】	毛泽东文革意识形态悖谬	唐少杰
【理论探索】	文化革命的目的与新阶级	赵越胜
【拒绝遗忘】	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回忆录（选载之五）	王复兴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研究报告】

毛泽东文革意识形态悖谬

• 唐少杰 •

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问题在文革史研究中是一个值得重视和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旨在对文革意识形态的几个方面，做出初步的梳理和评述。

◇ 意识形态现象

意识形态（Ideology）是一种旨在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观念体系。最初创造这一词的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A·D·特拉西，他用这个词来标志所谓观念科学，与那些解释性的理论、体系或哲学区别开来，成为一种负有使命的科学，进而为人类服务，甚至解救人类，达到使人们摆脱偏见、建立理性统治的目标。

意识形态既泛指任何一种注重实践的理论，或者指某种观念体系从事政治实践的意图，又特指意识形态具有五个内涵：1、它是一种关于人类经验和外部世界的解释性的综合理论，2、它以概括、抽象和整合的方式确立某种社会政治组织的纲领，3、它确定实现这种纲领所需要的斗争，4、它既要说服、吸收信徒或信众，更要求信徒或信众来承担义务或职责，5、它面向社会大众，但往往赋予精英人物或知识分子特定的领导任务。（1）

尽管意识形态的形式和体系繁纷复杂，多种多样，但是，毋庸置疑，意识形态的首要问题是某种观念对于人们的主导和统治的问题。意识形态现象就是思想和观念体系对于人们的统治和支配的事实。有趣的是，在台湾地区，人们往往把Ideology一词译成意蒂牢结。

关于意识形态，无论是从特拉西到马克思再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阐释，还是从卡尔·曼海姆到丹尼尔·贝尔的研究，也无论是从政治学、哲学的解析到知识社会学的理解再到文化学的阐释，至少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现实的、特定的意识形态完全取代了传统的宗教信仰（如基督教）或者古代的信念信条（如儒家学说）。无论这里有什么样的千差万别，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大概是到了20世纪初期，意识形态问题才真正成为世界性的、全人

类的问题，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主导性的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19世纪中叶对于意识形态进行了批判和阐释并赋予它贬义，但是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活生生的意识形态。

文革作为1966年至1976年中国大陆独特的社会历史运动，必然有着其特定的意识形态，也必然有着其意识形态运行的方方面面。文革意识形态是否属于20世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变种呢？回答是肯定的。文革意识形态在理论上主要源于马克思主义以及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继续革命理论、无产阶级全面专政观点〔2〕。文革意识形态的萌发、形成、运行不限于文革十年历史，在文革之前，阶级斗争学说就已经成为中共以及中国大陆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旋律，毛泽东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会议上对阶级斗争大张旗鼓的强调就是例证。又如，1963年6月至次年7月发表的中共中央批判苏共中央的九评文章，尤其是第九篇《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历史上的教训》〔3〕，实际上已使文革意识形态具有了雏形。尽管1960年代的最初五年还没有文革意识形态的整体出现和大肆实践，但是这种意识形态在一定意义上直接从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论战和分裂中脱颖而出。

作为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几乎直接影响了中国大陆数代、数亿人民生活各个方面的文革意识形态，它是文革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和占主导地位的观点、理论、学说、精神的总和。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来说，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学说〔4〕，即一定的社会生活中的思想制度，那么文革意识形态实质上就是文革的思想制度，它与文革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一起，形成了文革总体社会制度的鼎足之势。

◇ 阶级斗争让无产阶级专政

文革意识形态的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阶级斗争论，二是继续革命论，三是全面专政论。这三论不只是泛泛的、抽象的、笼统的阶级斗争论、继续革命论、全面专政论，而是文革独有的所谓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论、中国共产党（实为毛泽东本人）领导下的继续革命论、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论，换言之，这三论是与以往历史上出现过的阶级斗争论、继续革命论和全面专政论有所不同的。

这些不同主要在于：以往的阶级斗争论，还不是一种关于全社会甚至关于执政党内的斗争和分歧、清洗和整合的主要思想依据，而文革的阶级斗争论则成为文革全民斗争、全社会冲突的思想由来和理论基础，特别是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文革期间自我革命的重要精神前提。以往的继续革命论，从马克思主义学说及其实践的历史意义上来说，主要是把共产主义革命加以不同时间联结和不同空间转换的思想阐释和理论证明，而文革的继续革命论是文革得以铺排和深入的定海神针，特别是中国大陆社会以及中国共产党在文革期间进入自我异化般的自我革命炼狱的意识凝结和理论显现。在人类社会生活或历史中，还没有哪个国家、民族或政党像文革时期这样有着赤裸裸的全面专政论的思想主旨和理论取向，文革的全面专政论是文革一系列思想、观念、理论、学说直至风俗习惯、心理经验等等总和的极端表现，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文革期间出现了除了文革的发动者兼最高领导者之外而没有第二个人有可能处在安全、平稳和顺利的生存境况或生活事实的精神映照！

具体来说，阶级斗争论历史上源于19世纪初期法国复辟时期历史学家的发现和阐释。马克思明确地指出，发现阶级斗争不是他的功劳，他认为他的新贡献是指出由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5〕。毛泽东从早年接受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所在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6〕。这种有可能把马克思主义误读或误解为阶级斗争的理论几乎贯穿毛泽东的一生。毛泽东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所阐释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路线既是毛泽

东晚年的又是文革的阶级斗争论的集中表述，即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7）

◇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文革的阶级斗争论不同于以往的中共其他时期的阶级斗争论，主要在于前者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史无前例地既用于全民全社会，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又用于中共党内，尤其是用于整治和打击中共绝大多数的干部，还在于把阶级斗争论用于解决所谓世界观问题、思想意识问题甚至人们的知识、学历问题。依据阶级斗争论来划分和处理世界观问题乃至现实生活的一切问题，真可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不能不说是文革阶级斗争论的一大创造。文革阶级斗争论是文革政治运作以及文革意识形态铺张开来的一個杠杆。

继续革命论又可称为不断革命论。在文革之前，它大致上有两种层面的含义，一是以时间阶段（或纵向）为取向的、主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意义上的继续革命论，他们二人把共产主义的建立和发展划分为前后相贯的两个阶段，即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在前一阶段必须实施无产阶级专政。二是以空间阶段（或横向）为取向的、主要是列宁、托洛茨基意义上的继续革命论，他们二人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革命理论，力求把布尔什维克1917年十月革命拓展为欧洲发达国家乃至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了后来的斯大林则把建成一国社会主义论当成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转向世界革命的依据之一。

对于文革继续革命论的经典论述来自于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发表的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一文，该文对毛泽东的实际上也是文革的继续革命论的要点概括如下：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8）

◇ 自己乱了自己的内乱

正如龚育之对此所言：提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而革命又是在它的原义，即推翻现存的统治阶级的意义下来使用，这本身在理论上、在逻辑上就是荒谬的，在实践上造成了自己乱了自己的内乱。（9）其实，继续革命论既是文革对于中国共产党进行的自我革命的思想依据，更是文革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的革命的革命的理论基础。

继续革命论也是历史上的契卡（cheka）主义的折射、重现和深化，正如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巴卡京所言，契卡主义旨在没有敌人也要制造出敌人，即契卡主义，这就是根据一个臆造出来的方便公式，经常不断地寻找敌人。（10）文革继续革命论的矛头所向就在于从没有敌人到制造敌人、从外部敌人到内部敌人、从暂时敌人到永久敌人、从相对敌人到绝对敌人的几乎没有结束或没有穷尽的转换和演变。不断革命者总是先革敌人的命，再革同盟者的命，最后再革自己内部人的命。（11）

全面专政论源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而文革的全面专政论则由张春桥作了最有代表性的概述，他于1975年4月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中，提及马克思在《一八四八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论及无产阶级专政是要达到四个一切，即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出来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过渡阶段。在这里，马克思讲的是一切，四个都是一切！不是一部分，不是大部分，也不是绝大部分，而是全部！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直到地球上消灭这四个一切，使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决不能在过渡的道路上停下来。（12）

文革的全面专政论在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专政的历史上独一无二，别具一格，它不仅仅在林林总总的专制主义中独占鳌头，而且在形形色色的极权主义里独领风骚，其突显之处在于不仅仅对于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各个领域的全面钳制，而且在于对于毛泽东之外的几乎所有中共干部以及骨干分子的高度监控直至威胁、整肃和迫害。

◇ 文革历史社会的“空气”

上述文革意识形态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形成了文革意识形态的三位一体的结构特性和鼎足之势的功能格局，这三个组成部分的关系大致上说来，阶级斗争论是基础、是集结地，继续革命论是主旨、是前沿，全面专政论是核心、是制高点，但它们各自既有独特的取向和价值，又有相互衍生的递进关系，还有各自运用于文革实践而具有的显功能（manifest function）和潜功能（latent function）。

文革的阶级斗争论实质上一种极端的整治论，并由此而导致一种十足的人性歧视论。它把社会上的一切差别、把人的一切差别最终都归结为阶级存在以及阶级出身的差异。它的典型代表就是血统论、身份论，这种理论与历史上的种姓论、种族论、身份歧视论、民族迫害论等等几乎没有什么二致。（13）

文革的继续革命论实质上是一种典型的折腾论，（14）并由此而衍生出一种赤裸裸的泛敌论。体现了毛泽东设想过的类似文革时期中共党内的重大斗争，据说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15）后来演变成文革还要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的流行说法。毛泽东所说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16）即在继续革命论的映衬下，演变为七、八年来一次，来一次七、八年的社会持续动乱，在某种意义上，文革历史以及文革实践与继续革命论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相辅相成，形影不离。继续革命论的独特之处在于为文革奠定了理论基础，做出了意识形态的确证。

文革的全面专政论实质上是一种迫害论，并由此而演化成为一种极权的专制论，具体表现为文革时期无以复加的道德专政、言论钳制、思想控制和精神独断等等，上述张春桥所说的消灭四个一切就是文革所要追求和达到的乌托邦极权的天地。文革全面专政论成为了文革意识形态的氛围和文革社会历史的空气。

文革意识形态的三部分内容相互关联、相互渗透、相互转换，对于文革意识形态来说，它们一体同构，缺一不可。如果说文革意识形态表面上看似一座蔚为大观而实际上破朽不堪的金字塔，那么可以说文革阶级斗争论是这座金字塔的基石，文革继续革命论是这座金字塔的周边，文革全面专政论是这座金字塔的顶尖。

然而，文革意识形态的生成、演化、嬗变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在文革之前就已全部形成或在文革初期就已完备的，而是如同毛泽东所常用的湖南谚语草鞋无样，边打边像。从前面所提及的文革意识形态在中苏两党的论战和分裂之际就已具雏形，到这种意识形态最终形成或确立，大约经过了数年的历史。而文革意识形态的三部分内容在文革的不同时期或不同阶段又有不同的凸显，大致上可以说，1966年之前及1966年之际的文革酝酿和铺排，文革意识形态以阶级斗争论为重点，1967年至1970年的文革推广和深入，文革意识形态以继续革命论为基点，1971年至1976年的文革衰败和裂变，文革意识形态以全面专政论为焦点。当然，文革意识形态的这三部分内容贯穿于文革历史的全部过程和所有阶段，尽管它们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形势下有不同的表现和特征，但是它们本身就是文革意识形态的恶山险岭，重峰迭嶂。一方面，这一点可以从这三部分内容的演进关系体现出来，例如，阶级斗争论的必然是继续革命论，而阶级斗争论的至极是全面专政论；继续革命论是文革阶级斗争论的继续，而继续革命论是全面专政论的伴奏；全面专政论是阶级斗争论的结论，而全面专政论是继续革命论的归宿。另一方面，这一点还可从这三部分内容的内在转化体现出来，例如，文革时期的阶级斗争论、继续革命论、全面专政论三者的转化每每有一种倾向或趋势，这就是群众运动专政、党一国专政、领袖个人专政之间的相互转化。文革时期流行的一句意识形态话语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就典型地注明了这种转化。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的口号，是一种意识形态整合的概念，它排除其他的意见、其他的思想，不能容忍思想之间的共存，遑论思想之间的平等竞争，而必借权势之力，借革命口号对群众的煽动来消灭其他思想，它不容许讨论，不容许怀疑，只要人民群众绝对服从。这个绝对服从在表现形态来说，还不应只是强迫的，应当是具有最神圣的革命觉悟的最大道德自觉。在这个时期，说毛泽东思想成为宗教的教义，是毫不为过的。与‘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相应的，是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全面专政。后者是意识形态与国家政治权力高度结合的概念。（17）

◇ 意识形态的圣灵及神幡

文革意识形态具有一般意识形态所共有的特性：鲜明的强制性、相对的保守性、突出的虚假性（主要指虚饰、夸大的特性）、固有的封闭性等等。文革意识形态更具有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特性，诸如专制独断性、暴力粗暴性、领袖群众的互动性、滞后僵化性、工具实用性等等。除此之外，文革意识形态还具有其自身特别值得关注的三种特性：

一是文革意识形态的群众性（或全民性）。文革意识形态在一定意义上又可称之为文革群众运动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在文革时期的实践或运行有一个不同于文革之前的中共党国家意识形态的重大特点，这就是在毛泽东的鼓动和促使下，文革时期各行各业的亿万群众把文革意识形态这一批判的武器转化为全国全民全社会的武器的批判，即以群众运动化了的文革意识形态及其实践来冲击中共种种现有体制，打击中共干部队伍，几乎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期从很大程度上消解了除毛泽东之外的中共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威及其机制。一时间（特别是在文革初期），文革意识形态仿佛成为只为毛泽东与其亿万文革群众所互动共享而却为整体意义上的中共干部势力所疏远或疏离的意识形态，仿佛成为反权威、反官僚、反特权直至反对党的领导的文革广大群众的意识形态。

这种具有极大的群众广泛性的意识形态的一大特征就是简单明了，浅显易懂，方便可用，直观可行，因为，“群众运动意识形态并不需要高深完善的理论，更多的是需要有号召力、煽动力、动员力的激烈口号式的革命意识形态符号。（18）由于群众化的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的群众化，以文革意识形态武装起来的群众运动，就不只是限于对于过去的或已有的中共各级干部实施群众运动的所谓民主大暴政，而且还展现为群众运动内部的论战、残害、厮杀和吞噬。文革意识形态的群众性最终所展现的从群众运动到运动群众的轨迹，促使文革意识形态在群众性的意义上走向破败和销蚀。下面两种文革现象或文革事实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一是毛泽东文革初期倡导砸烂公、检、法，我个人理解，这是毛泽东力图把公安、检察院、法院等专政机关的职能下放到群众运动，由这种群众运动来实行以文革意识形态为依据的群众道德化的专政或专政的群众道德化，这种专政的灾祸就包括了对文革广大群众本身的施虐施害；二是可算作文革历史的一大景观：在文革所有群众中所发生、所进行的内讧和内战都是在同一位意识形态的上帝神统率下、在同一种意识形态的“圣灵照耀下、在同一个意识形态的“神幡”指引下加以切切实实地进行的。

◇ 裂隙不绝，穷于应付

文革意识形态的一大“领地”主要在于文革社会生活的群众心理意识层面，在于文革时期群众精神的显现和转向。当文革意识形态群众化之后，它的四分五裂、千奇百怪，特别是它的内在张力、冲突和破裂就不可避免，势在必行。文革意识形态自始至终的运作和实施都是破绽百出，裂隙不绝，穷于应付，疲于修补，在文革后期尤其如此。

二是文革意识形态经历了由意识形态化到泛意识形态化、再到非意识形态化、最终到反意识形态化的演化，即文革意识形态的走向或历程是一个值得瞩目、更值得研究的意识形态化泛意识形态化非意识形态化反意识形态化的过程。这似乎是文革意识形态演变的怪圈和宿命。

文革的意识形态化是指文革意识形态成为文革时期中共党国家社会的唯一的、强行的和宰制的意识形态的实施过程及其结果，这种意识形态化致使文革意识形态成为文革的政治文化活动乃至社会精神活动的依据，成为文革的主流思想意识以及权威话语体系的支柱。文革的泛意识形态化是指文革意识形态化所带来的扩张、强化、过度和泛滥的过程及其结果。类似于中世纪宗教的泛化带来了宗教文艺、宗教建筑、宗教哲学等等，文革时期的一切社会意识形式几乎都成为文革意识形态的具体表现，出现了文革话语、文革时尚及文革服装、文革政治、文革教育、文革文艺及文革戏剧、文革电影，甚至毛主席语录广播体操、毛主席语录太极拳（19）等等。文革意识形态的这种泛化几乎使它力图囊括或抑制所有的思想活动和生活形态，到头来，这种泛意识形态化不是力不从心，无能为力，就是适得其反，走向反面。文革的非意识形态化是指由文革意识形态化与文革泛意识形态化无所不及、无所不是而导致的无法限定、无法制止的反向过程及其结果。文革时期就出现了反复不断、多种多样的根据文革意识形态来解读、批评文革种种方面特别是文革的理论、政策的事实和现象，进而动摇或削弱了文革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文革时期普遍出现的那种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话语和事例就是这种非意识形态化的一个例证。文革的反意识形态化是指文革意识形态化、泛意识形态化、非意识形态化所促成的自我裂解、自我否定和自我异化的过程及其结果。文革自始至终，就一直具有不同于文革意识形态的诸多异端思潮在对这种意识形态进行着或修正、或批判、或斥责、或否定的工作，从遇罗克的出身论主张到杨小凯的省无联思潮，从普遍的怀疑一切倾向到周泉缨的四一四思潮，从李一哲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理念到顾准的经验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20）还有山西省出现的所谓张（珉）赵（凤歧）集团以及张耀明著的《论现状》对文革的批判等等，（21）都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三是文革意识形态的乌托邦实践性。文革意识形态在思想上和在理论上并不精致、深刻和奥秘，而是相当浅显、简陋和粗暴。文革意识形态在其实践上、在其运行上和其应用上远远“大于”、“重于”和“高于”其思想、其观念、其理论本身。“小谎言与大谎言的区别在于是否可以用经验去证伪，意识形态是最不容易证伪的大谎言，因为那本来就是一个与经验不沾边的神话。”〔22〕文革意识形态也是人类历史上特别是20世纪极其富有乌托邦实践的诱惑、空想和反动的代表或典型。

◇ 斗、批、改

毛泽东最初给文革确定的宗旨是斗、批、改，即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23〕林彪在1968年10月和1969年10月两次十一节庆祝大会上讲话都提到遵循和贯彻毛泽东的指示认真搞好斗、批、改，〔24〕在我看来，其实，后来的文革实践把这种斗、批、改延续为斗资本主义、批修正主义，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用毛泽东的一个简短说法就是斗私，批修。〔25〕

一方面，文革意识形态所强调的斗、批、改经不起推敲，本身就是伪命题，例如，文革不遗余力地进行的反对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从中国历史和现实来说，就不存在过资本主义时代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何以谈得上复辟？文革所千方百计根除的修正主义实际上是毛泽东把中共党内党外一切不同于他个人的主张和见解视为异端邪说的代名词。文革所要进行的改革一切不合理规章制度往往是视毛泽东的喜怒好恶而决定，常常是有悖于现今人类文明的现代化和现代性发展的。这些都可从文革时期所谓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发迹、衍生、盛行和衰落的过程深刻地体现出来。从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解放军学全国人民，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教育革命（以及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和工人阶级占领大学），再到五七干校、革命文艺、六厂二校经验等等，的确，在“文化大革命”，思想摆在了最重要的地位，〔26〕不仅文革意识形态的乌托邦实践的取向和目标，昭然若揭，变本加厉，而且文革本身更重要的还是一场意识形态的革命！“文化大革命”虽然有着政治上或权力斗争上的因素，但是它更深刻的意义是其意识形态性，从这个意义上可以称之为思想革命或意识形态革命。与政治革命相比，文化革命具有最根本的性质。通过这场革命，彻底扫清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永久地解决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创建理想社会的问题。〔27〕另一方面，从文革历史的所有阶段来看，从红卫兵、造反派运动以及夺权运动、清查、清队运动以及一打三反、抓五一六运动，到“整党建党”、批林批孔、批儒评法、批《水浒》、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再到教育革命大辩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等等，文革意识形态的乌托邦实践的本性就是能其所不能、为其所不为，正是毫不可行，才有所可行。这仿佛又一次验证了那句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的修正主义的名言，以致文革意识形态的乌托邦实践在实质上以运动等同了目的、以运动凌驾了目的、以运动消解了目的。“‘文化大革命’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说，就是思想革命，是带有根本性质的世界观革命。高度的理想主义结合高度的政治力量，使已经极端化了的意识形态带有宗教的特征，它是高度强势的和不宽容的，它负有崇高的使命，必须使自己扩展到社会的一切领域，一切与之不相适应的东西，或者改造使之符合，或者予以摧毁。”〔28〕

文革意识形态的乌托邦实践本身具有近似于宗教战争的或准宗教战争的内涵和特征，恰似历史上曾经发生或出现过的意识形态战争，在某种意义上，这种乌托邦实践也可谓一场准意识形态战争。诚如L·科拉科夫斯基断言，那种与完全的权力（total power）紧密捆绑在一起的完全的意识形态（total ideology）具有一种最强程度的完全，任何宗教信仰都

达不到这个程度。……它的目标不只是一要宰制和管制每个人的私人生活，而且根本就是替代私人生活，把人变成意识形态口号的复制品。换言之，它根本就消灭了生命的个体形式。

〔29〕因而，不难理解，文革意识形态带来的是无法形容的心理虐待、无法言状的思想绞杀、无以复加的精神毁灭和无不至极的灵魂混战。这种意识形态本身都使谎言不只是谎言了。如此完全的意识形态使得完美极权社会中的谎言有了一种特殊的功能和特殊的意义，这种功能是如此特别，如此具有创造性，以至于连谎言这个字也词不达意了。〔30〕文革这场准意识形态战争带来的是什么呢？心理的垃圾，思想的废墟，精神的瓦砾，灵魂的坟场，特别是给中国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以及给包括科学事业和人文建设在内的中国现代文明的发展，带来了无法估计、无法弥补的灾难和损失。

◇ 文革博物馆

文革意识形态是短命的，其运行或者说其横行的时间大约有十余年，可以说，正如随着毛泽东的去世而使文革尘埃落定，随着文革的离去，也使文革意识形态寿终正寝。然而，文革意识形态的影响和遗迹在今天的文革故乡还远远没有终结，至少，这种意识形态还没有完全地进入它应有的坟墓，还没有真正进入被历史、被后人所正视、所批判的文革博物馆。

文革意识形态是集文化极权主义、思想专制主义、精神蒙昧主义的诸多症候于一体的意识形态，它还是夹杂着封建主义、皇权主义、法西斯主义、民粹主义、民本主义、独断主义等等意识形态一系列症状的大杂烩，几乎在人类已有的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的历史中，还没有哪一种意识形态像文革意识形态这样一个在相对短暂的时间制约了如此众多的人民和作用了如此之大的国度；除了20世纪法西斯主义、纳粹德国种族主义和苏联党国的意识形态之外，还没有哪一种意识形态在现代历史上经历了如此必然的、深刻的、沉重的自我否定、自我异化和自我破产。就是在文革结束之后，一方面，在文革的故乡，与文革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中国现实政治生活都不可能真正地、全面地诀别文革意识形态或彻底抛弃文革意识形态，更有甚者，那些大大小小的文革遗老遗少们力图重续文革，竭力重现文革意识形态的幽灵阴魂。另一方面，对于今天文革故乡的绝大多数的人们来说，无论他们有什么不同的见解，也无论他们有什么不同的立场，在反对或抵制文革的复辟这一点上是有相当高度的共识，这也意味着他们在拒绝、否定和破除文革意识形态的重现这一点上具有不言而喻的共识。毋庸置疑，文革的故乡决不可能重现或复辟整个文革，因为，非常明确，首先没有毛泽东那种意义上的文革发动者兼最高领导者了，其次没有作为文革基础的群众运动了，再则没有作为文革支柱的文革意识形态了！

文革意识形态的命运和结局使得我们真正有可能对于一切激进的、革命的、专制的乃至乌托邦的意识形态加以祛魅、解析、警惕和防范。文革意识形态既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某种从革命到自我革命的意识形态标本，也是迄今为止出现过的所有意识形态当中极为罕见的自行衰亡的意识形态化石。尽管文革意识形态与现今中国的意识形态有着林林总总的联系，但是这两种意识形态之间出现的断痕、撕裂或衰变已无法修补或填充，更无法逆转或挽回，文革意识形态给现代中国所造成的整体意义的意识形态的衰弱和溃败是一目了然的事实，给当今中国所带来的全局范围的意识形态的嬗变和危机是有目共睹的现象。换言之，文革意识形态还是一首谱写出意识形态的神话、意识形态的神化、意识形态的异化这三部乐章的意识形态‘终了曲’。

因而，反思和剖析文革意识形态可以提供审视和把握文革全部问题的一面棱镜。无论文革故乡某些人对于文革全部问题有着怎样的失落、尴尬、苦闷、窘境，也无论革故乡总体上对于文革意识形态有着怎样的无奈、无能、无力、无为，批判和告别文革意识形态都是今天

和未来的中国（尤其是中国精神和中国思想）自我变革、自我进步、自我创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注释：

1，参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9卷第101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政变》、马克思，《一八四八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列宁，《国家与革命》等等。

3，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大学服务中心，2014年第三版。

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5，参见马克思：致魏德迈（1852年3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32—3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6，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47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

7，林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研究数据》

中册，第314页，1988年。

8，《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

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研究数据》上册，第609—610页，1988年。

9，龚育之，《关于继续革命的几个问题》，载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上册，第86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

10，巴卡京，《摆脱克格勃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录》，第16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

11，石名岗执笔，《山西文革亲历者的记忆与反思》，第776页，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

12，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研究数据》下册，第253页，1988年。（引文中的黑体为张春桥原文所加。译注）

13，参见遇罗克，《出身论》，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大学服务中心，2014年第三版。

14，根据百度百科的解释，折腾来源于满语的音译，有三种基本解释：对事物进行翻来覆去、反复的做和折磨的一种动作形态。所谓折腾，就是没事找事，无事生非；就是朝令夕改，忽左忽右，就是重复做一些无意义、无关联、不必要的事情。

15，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研究数据》下册，第24页，1988年。

16，毛泽东，《给江青的信（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7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17，刘晓，《意识形态与文化大革命》，第354页，台北，洪业文化有限公司，2000年。

18，同注17，第265页。

19，参见Daniel Leese: *Mao Cult—Rhetoric and Ritual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11, pp. 202—204。

- 20, 参见宋永毅、孙大进,《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香港,田园书屋,1997年。
- 21, 参见石名岗执笔,《文革中的山西文革亲历者的记忆与反思》,第639—659页,香港,天马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
- 22, 徐贲,《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第391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
- 23, 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研究数据》上册,第72页,1988年。
- 24, 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八年十月一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九年十月一日)》,同上,中册,第210页、第380页。
- 25, 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十月一日)》,同上,上册,第588页。
- 26, 刘晓,《意识形态与文化大革命》,第352页,台北,洪业文化有限公司,2000年。
- 27, 同注26,第208页。
- 28, 同注26,第237页。
- 29, Leszek Kolakowski, *Totalitarianism and the Virtue of the Lie*, in Irving Howe, ed., 1984 *Revisited*, New York: Harpe & Row, 1983, p. 126. 转引自徐贲:《统治与教育 从国民到公民》,第413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
- 30, 同注29。

~~~~~

## 【理论探索】

### 文化革命的目的与新阶级

• 赵越胜 •

文革地下读书运动中被广泛阅读的一些重要著作,激发了一些青年人的激烈讨论。吉拉斯的《新阶级》就是其中一本。当时一些青年就文革的性质和毛发动文革的目的与新阶级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反思。在他们看来,毛发动文革恰恰是为了新阶级独占统治权。

问:上一次的节目中,你谈到了文革地下读书运动是真正的启蒙运动。今天想请你给听友们更具体地讲讲这一点,最好能从当年地下读书运动中最重要的著作入手。

答:这当然好,但也可能有点抽象,听起来乏味。不过既然这是很重要的内容,我就试着谈一谈。就我个人所熟悉的地下读书运动,其中最让人震动的书是吉拉斯的《新阶级》。我记得当时的作者被译作德热拉斯。我的几位大朋友曾有很长一段时间阅读和讨论这部书。我受他们的影响,也认真读了这部书。可以说,我心目中的所谓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理想,让这部书打得粉碎。首先,这部书简明扼要地从哲学上论证了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只是哲学发展中的一派观点。到了列宁手中,它完全变成了蒙昧主义的工具。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已不复存在。如果说在马克思那里,辩证唯物主义还有一点探索真理的意义,在列宁那里已经完全变成了自大狂的宗教信条。从前听到那些共产党的宣传口号,什么“只有共产党发现了社会运动的真理”、“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总觉得不可信。看了吉拉斯的这部书才明白,所谓共产主义是人类解

放的“唯一真理”、“唯一道路”，不仅不真，而且是个大灾难。循着这条路走，只能建成一个前所未有的暴力专制国家。

问：那这样看，对文化革命中宣传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不是也会产生怀疑？

答：当然。在这部书中，吉拉斯有句名言：“共产主义革命根本不可能完成他们狂热地信以为可能的事情。因此没有其他革命，比它许诺的如此之多，而完成得如此之少”。看看自己周围的现实，会发现共产主义的宣传和允诺同现实生活差距如此之大，再仔细想，甚至能发现它的许诺与它的行为往往正相反。记得当时我们争的最多的问题是，毛发动文革，提出整党内走资派，是不是毛意识到了新阶级的问题，要通过文革来消灭这个党内新阶级。当时争论得极为激烈，因为对毛个人的迷信还牢牢盘踞在我们这些青少年的心中。有怀疑但没有勇气否定毛。结果就出现了悖论，从理论上所谓共产主义理想这套东西已丧失了现实的说服力。可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毛还心存敬畏。

问：这个冲突很尖锐啊，你们是怎么走出来的呢？

答：当时引我们走出悖论的是《新阶级》这部书的第二个要点：新阶级的形成和运作方式。吉拉斯分析道，新阶级其实就是从夺取了政权的、共产党中的职业革命家组成。它的主要特点有六，其一，这个阶级实际上是共产制度官僚中的一个特殊阶层，即党的政治官僚。其二，这个阶级的经济基础便是所谓全民所有制。凡是冠以全民之名的财富，实际上就是这个新阶级自身的财富。所以在类似前苏联、中国、北韩这样的国家，国库党库是不分的。这个新阶级可以任意侵吞国库，用全体国民的血汗来养党的各类机构。例如所谓工、青、妇，甚至人大也实际上是党的一个机构。同时还养它自己的报纸宣传机关，甚至国家的军队都变成了这个阶级的家丁。其三，由于所谓国家财产就是这个新阶级的私产，所以他们可以任意挥霍，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全世界送钱，搞各种面子工程，劳民伤财而完全不顾及国民的意愿。其四，这个阶级的最上层可以按照等级享受各类特权，修行宫建别墅，圈起国家最好的地方为自己私用。其五，对国家外交政策的选择，必然会首先考虑一党利益，在党的利益和民族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一定是按照党的利益来做，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动用国家暴力来捍卫一党之私。其六，这个阶级的权力更迭转移，一定是通过黑箱作业，私相授受，若不能通过党内交易完成，就一定会是血雨腥风的宫廷斗争。

问：看起来吉拉斯的分析还是很符合实际，很客观的。

答：当然啦，因为吉拉斯本人从前是圈内人，他甚至也是新阶级的一分子。他是南共联盟的中央执委，中央书记，国民议会的议长，副总统，可谓位高权重。但是他却认为，追求真理讲出真话，是人生的基本价值。一旦他发现了所谓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革命不过是造就了一个新阶级，这个新阶级对人民的掠夺和镇压比此前的统治阶级更残忍、更无耻，他就不顾高官厚禄，不怕坐牢判刑，开除出党而说出真相。当时我们读他的书，虽然有争论，但对他这个人都是真心佩服。但是问题仍在，毛发动文革真的是要推翻这个新阶级吗？经过反复讨论，大家逐渐取得了一定的共识，那就是毛的文革并不是要解决共产党这个新阶级本身，而是要使这个新阶级按照毛本人的意志来行动。因为他要达到的目的，不是让中国成为一个自由的民主宪政的国家，而是要让中国人永远生活在他从俄国搬来的共产体制之下。而新阶级产生的土壤，恰恰是这个共产体制。所以不管毛提出了多少鼓励老百姓造反的口号，无论他怎样号召打倒党内资产阶级，都和推翻新阶级无关。相反，文化革命的指导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正是为了巩固他从苏俄搬来的这个制度。所谓“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就是让新阶级永远成为中国社会的统治阶级。当时在讨论中，有人坚持认为毛是有善良愿望的，只是对新阶级没有真正的认识。也有朋友指出，不是毛对新阶级认识不足，相反他的逻辑

辑是极为清楚的，是打了天下就要坐天下的逻辑。他认为，只要能保证共产党在他的绝对控制之下，就能保证共产党的江山不丢，这实际上恰是把国家当成一党私产的意识，这也恰是新阶级的根本意识。正像吉拉斯在书中所指出的：“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最后竟造成了一个握有空前绝后权威的新阶级，这个阶级是由那些垄断行政大权而享有种种特权和经济优先权的人们构成的，党是这个阶级的核心和基础，党的核心人物就是掌握全权的剥削者和主人”。

问：当时你们是不是也讨论过中国未来的出路？

答：当时有各种设想，最集中的一个想法就是毛身后党内权力斗争会引起党的分裂。那时可能会出现新的力量来主导中国的方向。但是什么方向却不能肯定，只是有一点，中国必须要改变，这已经是党内外明智之士的共识。所以后来邓主导的改革开放得到了一致的拥护。但是由于产生新阶级的制度土壤没有改变，新阶级依然牢固地把握着中国。唯一的变化是，在吉拉斯看来，新阶级的财富占有是通过党对权力的占有，因而是不能继承的。可中国目前的状态，是官二代、富二代浑然一体，他们不但掌握着目前的权力和财富，而且也掠夺了全体国民的未来，这才是最可怕的。国内有许多人看到了这一点，所谓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固化，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新阶级对全体国民的掠夺，只能靠国家体制向民主宪政转型来改变。这将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 原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网

~~~~~

【拒绝遗忘】

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回忆录（选载之五）

• 王复兴 •

（上接 z k 1 7 0 1 b，第五章 1 9 6 7 年北大再次大乱）

1 1、陈伯达“6·5讲话”，“66串联会”出世

6月5日清晨天没亮时，陈伯达突然来到北大的大饭厅，对学生讲话，聂元梓听说后也赶到。陈伯达对学生及聂元梓讲，“文化大革命是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你们学校越乱越好，你们校文革摇摇欲坠才好呢。”“北大是一潭死水，不行啊。没有波浪有什么意思？”“聂元梓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注：陈伯达6月5日清晨有没有到北大讲过话？对这一史实人们争论较大，我是根据聂元梓的《回忆录》及《口述自传》及本人的记忆，确定此事为实。陈伯达6·5针对北大有两次讲话，一次在6·5清晨天没亮时在北大；另一次是6·5深夜在人大大会堂。6·5清晨在北大大饭厅的讲话，聂元梓口述录音带整理的《口述自传》中，对陈伯达6·5清晨在北大大饭厅附近的讲话，有详细回忆的记录。我在6月5日上午在校园已看到大字报《陈伯达讲话》，其中印象最深的一句即“北大是一潭死水”。这句话陈伯达6·5晚在人大大会堂没讲过。但这句话在6月5日、6日两天就已在北大传开了。许多北大校友都记得在6·5日、6日已知此句话。那么陈是在什么时间讲的呢？应该就是6月5日清晨在北大讲的。陈的这句话极具杀伤力。它意味着北大必定分裂，必定大乱。当时对我震撼极大，记忆深刻。米鹤都编撰的聂元梓口述史《往事与尘埃》中的《九十回眸》第272页也记载了完全一样的史实，证实我的记忆无误。）

6月5日晚至6月6日凌晨，陈伯达针对北大做了第二次讲，他在人大大会堂中央文革接见首都红卫兵代表的会议上，对聂元梓、“新北大公社”说，“你们要用吴传启这个名字来做内战的口实，一定要垮台。”（陈再次不让新北大反吴传启，但话说得比以前重多了，威胁聂再反吴要“垮台”。）并且对聂、孙挥舞大棒，说“你们现在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想夺无产阶级的权。”（注7）这是陈伯达针对北大的第二个“6·5”讲话。

当时中央文革威信极高，如日中天，权倾天下。陈伯达做为中央文革组长在6月5日针对北大二次讲话，如此上纲上线，挥午大棒，如泰山压顶，是要把聂、孙、“新北大公社”压垮，阻挡以新北大为首的北京反吴传启、反王、关、戚的浪潮。对陈伯达“6·5”两次讲话无需深入解读，其意很明白：第一，他挑动北大分裂；第二，他要北大大乱；第三他煽动反聂元梓，上纲上线，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第四，他是要阻止新北大反吴传启的攻势。陈伯达做为中央文革组长，讲出如此重话，会产生什么效果？那是可想而知的。他为什么施出如此重手？这里有个直接的背景，即5月27日的中央文革接见。（聂元梓《回忆录》误记为5月28日。这次接见会的详情，我们学生都不知道，只听说了一些皮毛，详情是四十年后才知道）

5月27日下午2：00，陈伯达、关锋、戚本禹把聂元梓叫到钓鱼台谈话。陈伯达说，“我们是受江青委托和你谈话的。”“我们非常希望和你合作，你要和我们站在一起。”“你不要反对吴传启了，更不要把我们和他联系起来。陶铸反关锋就是从反吴传启开始的。”聂元梓回答“就是吴传启在搞两大派，到处伸手，制造分裂。”关锋插话“北京分两大派，你要负责。”“你态度不好。”关锋又说，“你要揪出反谭震林的后台，如果是那样，我们就奉陪。你们还要保余秋里，提醒你们，不要再犯错误，再犯大错误可能就爬不起来了。”聂元梓始终没做一句检讨，也没表示同意合作。关锋、戚本禹没等聂讲完话，便拂袖而去。聂元梓见状很不满，便起身退席，陈伯达追上来对聂讲，“不要生气呀，我们要合作哦。”（注8）

2004年我拜访聂元梓，聂对我讲“江青、陈伯达他们，当年要我‘合作’，上他们的‘船’，我不肯。于是就整我，整新北大。”聂的意思，应是指此次“5·27接见”。此次接见表明，中央文革是个整体，很难把王、关、戚从中切割出来。这应是聂元梓一直对“5·27接见”的详情保密的原因。实际上，反王关戚就是反中央文革，就是反江青，这种认识，我是在文革结束多年之后才悟到。但是当年不但认识不到，根本不敢朝这个方向去思考，而且认为要捍卫以江青为代表的中央文革。

陈伯达6月5日清晨在北大的讲话，于6月5日上午就有人在校内贴出大字报《陈伯达讲话》，北大一下炸了锅。6月5日晚陈在人大大会堂的讲话，在6日也传遍校园。下面排个时间表，看看从6月6日至6月9日这短短三天，在陈伯达6月5日的二次讲话后，北大发生了什么：

据《北京大学纪事》记载：

6月6日，“新北大井冈山公社”（注：人称为“井”）成立，发表宣言。脱离新北大公社，反对聂元梓、校文革。

6月7日，“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注：人们称为“团”）成立。造“新北大公社”的反，造校文革、聂元梓反。历史系“延安战斗队”的靳凤毅是头头之一。

6月8日，“新北大北京公社”（注：人们称为“0”）成立。反对聂元梓、校文革，骨干是化学系0363战斗队，头头是陈醒迈，郭罗基参加。“0”派人数较多，约有近1000人。

此前于5月17日成立的“新北大东方红公社”（人们称为“红”，仅有几个人，头头是樊立勤）和5月22日成立的“红旗飘战斗队”（人们称为“飘”，有十几个人，头头是牛辉林）这两个组织较早时在5月分别发表“宣言”，造校文革、聂元梓反。他们在5月成立时没有多大反响，但6月5日后突然变得活跃，有了一些影响。“红旗飘”是五个反对派组织中最左的一派。

陈伯达的讲话影响极大。那几天，我原来的一些观点一致的好友，有些也脱离了“公社”，分裂了出去。如《横扫千军》的徐云辉、原来“红旗兵团”时的战友杨百瑞、历史系“延安战斗队”的好友李炳煌等。

以上三天，从“新北大公社”分裂出去了三个反对派，加上5月时成立的“红”、“飘”，人称“井、红、团、0、飘”。北大师生再次分裂，燕园大乱特乱，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内战”，直至武斗。这就是陈伯达“6·5讲话的社会效果，反观其动机，昭然若揭。效果验证了动机，动机导至了效果，动机、效果高度一致。

同在6月8日，“新北大联合战斗团”（人们称其为“联战”）成立，对校文革和聂、孙采取死保态度，抵制对校文革整风，尤其推崇孙蓬一。头头是卢平，主力战斗队有历史系“桔子洲”等。人数有1000多人。

6月9日“六六串联会”最后登台，发表《声明》，稳住了“新北大公社”动荡的局面。“6·6”声明，反对分裂，坚持批左，支持聂元梓，但要求聂元梓、孙蓬一纠正错误，继续整风。《北京大学纪事》说6月9日“6·6串联会”发表了“八点声明”，“声明”是由16个战斗队联署。这一记载不准确并在《聂元梓回忆录》中被错误引用，以讹传讹。6月9日“6·6”的声明是“九点”，不是“八点”；有20个战斗队联署，不是16个。抬头是：《首都红代会新北大公社“六·六”串联会声明》。有11个系（战斗团）的20个战斗队签名，即：红六团“红色清道夫”、“红梅”；红七团“东方红一支队”、“文二（四）一支队”、红十七团“扫雷一支队”；红一团“红军”、“扬子浪”；红十一团“顶风船”、“舞东风”、“岿然不动”；红九团“大无畏”、“108纵队”；红四团“第二刺刀见红”；红二团“横空出世”；红三团“起风雷”、“全无敌”、“大无畏”；红十二团“红旗”；红十五团“挥斥方遒”；跨系的“横扫千军”。

这批著名战斗队极有影响力。“6·6”的声明贴出后，一下稳住了“新北大公社”不断分化的趋势。“九点声明”的落款最后是：“联络地点38楼313、502”。313室是“红梅”王复兴、王渊涛、俞政、徐森、张文虎5人的宿舍。502室是“红色清道夫”刘庆柱、张绍清等人的宿舍。

6月14日，“六六串联会”举行成立誓师大会。在38楼前，红旗林立，歌声嘹亮，口号不断。大会进行一半，下起大雨，游行开始，冒雨行进，行至图书馆前广场，进行宣誓，气氛悲壮。参加大会和游行的有3000人左右。大会由我主持，黄虹坚领呼口号。口号有：“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斗争到底！”、“干扰斗争大方向的井冈山、东方红决无好下场！”、“坚持团结，反对分裂”、“聂元梓、孙蓬一必须纠正错误，继续整风！”、“排徐左、右干扰，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等等。据后来粗略统计，“6·6”当时有6000人之众，在北大是人心所向，成为稳定北大混乱局面的中流砥柱。

“六六串联会”诞生的过程是这样：陈伯达6月5日讲话后，由于中央文革在师生中威信极高，“公社”内部人心慌慌。我和好友们都在想：要不要紧跟陈伯达讲话？要不要脱离“公社”？我们应如何确定自己的立场？我出面召集了二十个战斗队的队长，从6月6日起，连续开了三天串联会，上午、下午连轴转，讨论形势，交流观点，确定立场。第一次串联会是6月6日晚上在大操场举行，大家围了一圈席地而坐，讨论形势。扬子浪建议“退出公社”，但大多数人主张仍留在“公社”，但要继续给校文革整风。大家强调，校内要反对分裂，反对内战。校外要继续反吴传，反极左。尔后扬子浪也赞成了大家的意见。三天串联会会议由我主持，我记得参加串联会讨论的有：王渊涛、俞政、陈双基、索世晖、扬子浪、黄诗云、陈振民、马云龙、程仁双、赵春福、史新国、任瑚琏、阎志胜、李长啸、马西沙、沈永友、胡宗式、金崇顺、黄虹坚、张绍清、刘庆柱、彭浩、梁国安、孟关霖等人。这些人后来大部分成为“66”的骨干。讨论了二天后，于7日晚由索世晖起草了“九点声明”第一稿。8日开会讨论索世晖的草稿，反复讨论，逐句修改。最后由“红色清道夫”的张绍清起草第二稿。6月9日早，开会通过张绍清的第二稿后，马上抄成大字报并在大饭厅南墙贴出。自此，“六六串联会”在乱局中出世。（有的回忆北大文革的文章，说“66”是聂元梓指使成立的。这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赵建文后来告诉我，6月6日后聂元梓曾找他嘀咕，很担心校文革垮掉。“66”出来后，她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历史系“红色清道夫”的刘庆柱（考古四年级学生）告诉我，系文革的吴维能和魏杞文老师找他，说他们代表一批历史系教师“赞同‘66’，参加‘66’。”扬子浪在6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66’串联会就是靠这一纸声明站住脚了。”他在6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66’登台后对立面明显地树立起来了。”“整个北大无头绪的动乱，看来将在相对稳定的两派对立中进行了。”

有些人说，“六六串联会”的“九点声明”在北大文革史，以至于红卫兵运动史上，都是一个重要文献。“北京大学纪事”只引用了一句话，是由二条拼成的一句：一条是“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革命的主要对象，革命不共戴天的仇敌”；另一条是“‘东方红’、‘井冈山公社’的跳梁小丑兴风作浪，没有好下场。”据查，“66”从6月9日至13日，先后贴出了三份影响很大的文件（大字报）。

下面分别引述并做简要评述。

在6月9日的第一个“九点声明”中，除了“北京大学纪事”引述的“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那句及警告“‘东方红’、‘井冈山’”这句之外，还有一些重要内容，如：“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大方向，反对打内战。”“北大必须大乱的口号必须批判。”这实际是在抵制陈伯达要搞乱北大的意图。（陈伯达在“6·5讲话”中说“北大是一潭死水”，“你们学校越乱越好。”“6·6”的声明却针锋相对。）由于中央文革、陈伯达当时拥有极高的威望。此外当时我们知道上海的学生造反派“红革会”因“炮打张春桥”而迅速垮台，挨整。因此尽管我们对陈伯达的讲话不理解，但当时的形势决定我们只能“暗抗”，而不能“明顶”。因此“声明”表态“陈伯达同志对北大的批评非常及时，好极了！”“我们一定要根据中央文革的指示，大造聂元梓、孙蓬一同志错误的反！”对聂、孙的造反严格限制在对聂、孙的“错误”上。但“6·6”对聂、孙错误的批判是真诚的而非虚假的。我们坚持自三月整风以来对校文革的批评态度。“声明”指出要“彻底批判聂元梓、孙蓬一的错误，并肃清其影响。”要“边整风，边战斗。”并提出“彻底改组校文革”、“大力提拔革命小将”的述求。“声明”批评了“公社”内部死保孙蓬一错误的“联战”个别成员，指出：“死保孙蓬一的错误只能断送北大的文化大革命。”认为这样会把群众推到对立面。这里点出了“公社”内部的分歧与矛盾。后来到了67年底、68年春，“66”核心成员与孙蓬一在大联合与停止武斗的问题上，发生日益尖锐的矛盾与斗争，6

6年6月时已露出苗头，只是这种内部矛盾被与对立面的斗争所掩盖。“66”当时的状态是两面作战，对内对外，里外开弓，反对极左。

当时在公社内部，“66”派批评“联战”派“死保”，是指“联战”不应“死保”聂、孙对待群众的错误态度，压制3月整风以来群众对他们的批评。错误地批判提意见的师生是“逆流”，是“砍5·25红旗”。“66”认为“联战”这种态度是为校文革帮倒忙，把许多群众推走。但“66”和“联战”对于更大的原则问题，如反吴传启、反极左思潮、支持校文革，反对北大分裂（实为抵制陈伯达“6·5”讲话）、保周等大方向上是高度一致的，是困局中的战友。

“66”在6月13日以大字报公布了第二号“声明”，此次才是“八点声明”。署名“临时勤务组”。“二号声明”提出“在新阶段提出的问题是，背离斗争大方向，热衷于打内战，从右的，或从左的方面，动摇无产阶级专政，”“这种现象，在全市，在全国都普遍存在着。在北大尤为严重。”在这段文字中，明确指出存在着左的干扰，其主要表现形式是“热衷于打内战。”批评道：某些人“企图把红色政权打成白色恐怖”，“重新发动全面夺权，宣扬二次革命，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严重的方向错误。”此处尖锐批评了“井、红、团、0、飘”的极左思想。“二号声明”还提出红卫兵要开展自我批评，自觉改造思想，指出“我们面前的大课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之后，如何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从而如何掌好权，用好权。”要求红卫兵开展自我批评。

上面记述的是“66”的第三份文件（二号“声明”）。在时间顺序上，在“二号声明”之前还有一个文件，是于6月11日“66”“起风雷”战斗队贴出的大字报《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夺权》，此份大字报是由“66”核心组成员、化学系的陈双基起草，反映了“66”的观点。下面引述2015年6月底、7月初，北大几位校友之间，交流、追忆、核实当年“66”的几份文件，特别是6月11日“起风雷”的大字报之情形。

为了寻找48年前“六六串联会”公布的几个文件，扬子浪发电邮向校友胡宗式（当年新北大公社《动态报》负责人）求助，胡宗式找到了“66”的三份文件的底稿，把扫描件电邮给了谢定国（扬子浪）、索世晖、任瑚璉和我。胡宗式后来告诉我，“66串联会”的文件是孙蓬一保存的，而后辗转到了胡宗式手中。这三份文件是：“六六串联会”的一号“声明”（即九点声明）；起风雷战斗队的大字报《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夺权》；二号声明（八点声明）。扬子浪收到胡宗式寄来的资料后，回复电邮：“宗式兄，谢谢寄来的文件，是北大文革史的珍贵历史资料。也拜读了你最新关于北大文革的文章。北大有些人反聂，现在还拿聂说事，都可以理解。但把‘反聂’吹嘘成‘革命’、‘正确’、‘反文革’，甚至是‘继承了北大传统’，就滑稽了。祝好。谢定国。”

第二份文件是03（化学系）“起风雷”战斗队的大字报，“起风雷”是谁？我想不起来了，猜想可能是化学系的陈双基，于是发电邮向他询问，果然是他，陈双基回电邮告诉我：“复兴：你好！信收到，难得胡宗式还保存有当年‘66’的资料。03起风雷是化学系我们班战斗队的名字。我是写过一篇长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都是咱们一帮人讨论过的观点。写完大字报，贴在大饭厅东南角的南墙上。随后在31楼西边的食堂里，召开过一次研讨会，讨论大字报提出的内容。”

6月11日陈双基代表“66”写的这张大字报，评的是陈伯达在6月5日晚在人大大会堂批聂最重的一句话。对陈双基这张大字报，王渊涛曾多次说，此大字报把陈伯达所说“聂元梓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夺权”这句话扭了过来，顺了过来。意思是把政治上判了死罪的一句话，解释成因世界观的问题而犯了一般性错误的问题，解释成知识分子必须

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问题。大字报说，“曾经起过先锋和桥梁作用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当革命运动深入发展后，必须和工农结合，否则就会犯错误，动摇无产阶级政权。”

“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是广大的工农兵。”“北大运动一直是走在前面，当学生运动显示先进性时，我们打了第一炮。现在学生运动走入歧途的时候，由于我们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也带头犯了错误。陈伯达同志的重要指示，给了我们当头一棒，使我们清醒。我们要高举革命批判的大旗，从错误中杀出来。”“这是我们的光荣使命，也是我们对聂元梓、孙蓬一的殷切希望。”

该大字报借陈伯达的批评，对学生运动中的普遍性的缺点、错误进行了批评，这应是扬子浪记忆中的红卫兵首次公开自我批评。大字报指出当时红卫兵中普遍存在着“无政府主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愈闹愈多，愈闹愈大。”这是同时批评了北大、北京的两派。后来派性泛滥，爆发武斗，思想根源盖源于此。大字报进一步指出，“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彻底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而有两面性。”“身上带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等。”应当“对自己坏的一面引起高度注意。”大字报尖锐批评了本派校文革的领导，指出“个别人，不认真改造自己，就必然被历史所抛弃。”“聂元梓、孙蓬一同志，猛醒吧！”大字报重点批评了本派的孙蓬一“用主观唯心主义的东西来夸大阶级斗争的严重性，表现出右倾或‘左’的可爱，进而打击、压制不同意见。”“66”的这一认识，后来成为在“公社”内部“66”派反对孙蓬一坚持打内战、搞极左的思想基础。

“66”的三份文件，抓住了人心，赢得了众多师生的支持、拥护。6月14日大游行之后，“六·六串联会”一度成为新北大公社的主流，也是当时四分五裂的北大中，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众组织，有6000多师生。

我和索世晖当时是“六六串联会”的召集人。“66”没有固定的“勤务组”（总部），核心组成员有：王复兴、索世晖、沈永友、扬子浪、陈双基、任瑚璉、阎志胜、李长啸、张绍请、刘庆柱、马西沙、黄虹坚。沈永友口才好，为人沉稳，后来成为“66”的对外发言人并主持群众性大会。就这样，在不经意间，因缘际会，我被形势推到北大运动的风口浪尖。“66”成为“公社”的主流有二个月时间。8月初，对立面“井、红、团、0、飘”联合成立统一的组织“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同时，“新北大公社”的“66”和“联战”也实现联合，重组了“新北大公社”总部。我就乘机急流勇退了。

1 2、聂元梓带我见李敏

大约在6月下旬的一天，聂元梓让校文革办事员找我，我见到她后，只有她一人，她只简单地说了一句，“你带我去个地方”，我便坐上汽车跟她走了。小车开到国防科委宿舍楼，她留下司机，下车后对我说“我带你去看看李敏。”随后她带我一人去了李敏（毛泽东女儿）家。看起来她和李敏很熟，进屋坐下就聊天。聊了一小会，她对李敏说，要借红机子（可直通中南海的保密专用电话）用一下。李敏说，行。后来俩人又闲聊了一会儿，我坐在一旁插不上话。不知什么原因，聂没打电话，就带我回了北大。在李敏家大约只呆了30分钟左右。我一直好奇，聂元梓那天要给谁打电话？说什么事？但我不好问她。或许，她只是向我表示，她有一条通天渠道。此外我有个感觉，她当时对“六六串联会”非常信任并且依重。

那时，校文革开会，聂元梓有时会派人叫我列席。

1 3、谢富治接见北大校文革

6月15日，“井、红、团、0、飘”召开批判聂元梓资反路线大会。他们要聂到场，接受批斗，聂拒绝出席。他们便宣布举行静坐抗议。所谓静坐像个热闹的大聚会，一片喧闹。

针对北大混乱局面，聂元梓要求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接见，协助解决北大问题。6月20日下午，谢富治在人大大会堂接见了北大校文革代表。聂元梓通知我去。在接见时，聂元梓要求市革委会帮助解决北大的混乱局面。谢富治拿出一本毛主席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念了几段，然后说，“北大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以造反手段对待校文革是错误的。”等等。另外，他讲了一段历史，讲的是“在长征途中，张国涛闹分裂，另立中央。”的事情。（我当时心中闪过一丝不快，感到这是暗示聂元梓反吴传及其后台是针对中央文革某些人，是分裂中央。）谢又说“北大没有分裂中央文革、分裂市革委会的责任。”（我觉得这似乎是反话正说，正面引导。）聂元梓回校，传达了谢富治有利于校文革的讲话，“新北大公社”士气大振。聂元梓比较冷静，马上布置了校文革继续整风的事项。

“六六串联会”在与“井、红、团、0、飘”对抗的大形势下，仍始终坚持对自己所支持的校文革进行严格整风，督促校文革正确对待群众，改变官僚作风。“66”这种对外、对内两线作战的状态是难度挺大的作法。有一次给聂、孙开门整风，群众提意见，炮轰校文革，“井、红、团、0、飘”竟然冲击会场，于是“66”又马上回过头来对他们进行抗议游行。

6月26日、27日两天，校文革举行了整风大会，聂元梓、孙蓬一分别做了检查。聂元梓的检查较好，孙蓬一不够诚恳。“66”战士纷纷提出意见，要求继续整风。29日校文革再次召开整风大会，孙蓬一再次做检查，此次老孙有很大进步。扬子浪在“日记”中写道：“老孙这次检查好。”

14、关于牛辉林

7月上旬的一天，“六六串联会”在办公楼的小礼堂召开大型串联会，讨论形势。我主持会议。会议刚开始，牛辉林就领着“红旗飘”的十几个人冲进会场。牛辉林冲上主席台，从我手中把话筒抢走，并和另外两个人一起把我推下主席台，我反身要再上主席台，牛辉林站在台上，竟对着我胸部，居高临下踹了我一脚。我为避免武斗，领着几百名“66”群众撤了出去。“66”有的群众埋怨我窝囊，但如不退让，就会爆发武斗，几百人还不把牛辉林他们十几个人给打惨了，无论如何也不能这么干呀。那时要坚持正确的做法很难，但必须坚持。

事后我对朋友们说，牛辉林算那门子造反派呀？造“66”群众组织的反，算造反？把我推下主席台还用脚踹我，算是造反派？我只是个群众，又不是走资派，我好歹和他在文革前还是北大体育队的队友呢，同在运动员小食堂吃饭，常见面的呢。我在田径队，到了66年冬季未名湖一结冰，运动队领导就把我临时从田径队调到冰上队，准备参加高校冰上运动会。牛辉林练花样滑冰，我练速滑。俩人算是正经八百的北大冰上队队友。我在66年1月的北京高校冰上运动会上取得3000米速滑冠军（北京大学纪事1966年1月16日有记载），他没取得过什么名次。俩人虽没说过话，但互相都知道的呀！到了文革，他怎么就变成这样了？阶级斗争激活了他人性中的什么东西呢？他在“5·25”时，死保陆平，在第一张大字报前面和别人辩论。到了“6·1”广播大字报后，他被群众要求站在校园的桌子上，被学生们围着批判。到了66年8月他又率先组织清一色由革军、革干子弟组成的红卫兵，搞血统论。他因觉得聂元梓、校文革不够左且不搞血统论，到66年11月以后就造

校文革的反。到了67夏季又搞极左，反校文革，反军，反周。他在运动的每一个阶段都要走向一个极端，但前后又缺乏一以贯之的逻辑性。突出的特点是激进主义，外加风头主义。这是一位在当时开展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大环境之下受极左思潮影响较大的同学。

文革后，赵建文与原“井冈山”负责人徐运朴约会、聊天，十分友好，经常一块喝酒，成为好朋友，两人对北大文革取得共识：认为两派有三点一致：一是两派都保护北大的古迹、文物、图书。北大的古迹、文物、图书，历经文革，毫发无损；二是两派共同建造了校内巨大的毛主席塑像，都迷信、崇拜过伟大领袖；三是两派都保周（保周恩来）。我对赵建文讲，他们的“共识”基本正确，我基本同意。但有一点不对。他们总结的三个共同点，适用于两派绝大多数群众。但不适用于“红旗飘”的核心人物牛辉林。因为他反周，我有重要旁证。在1966年6月中旬，哲学系“66”成员“顶风船”队长赵春富和史新国俩人找我，他们表情严肃，告诉我，他们两人在“红旗飘”总部办公室窗外，偷听了牛辉林等人讨论形势。牛辉林分析：当时中央的路线斗争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周恩来到处救火，灭火，保护老干部，是新的保守派的总后台。聂元梓和“新北大公社”就是保周的新保皇派。他们要反聂，反周，造反到底。（这就是牛辉林“红旗飘”秘而不宣的纲领。）赵、史二人当时有些嘀咕，牛辉林对形势的看法对不对？担心“66”会不会站错队？我当时坚定地对他们俩人讲，“总理是好人，不能反，没了总理国家会成什么样子？我们反吴传启、林杰没错！一路走来看得很清楚，他们是极左，破坏文化大革命。”

在1967年的3月至8月，北京高校中曾出现过一股反周恩来的暗流。牛辉林所谓的新文革与旧政府之争、周恩来是旧政府保守势力总代表之说，在地派也有个别人向外放风。我就不止一次听到过这种流言。聂元梓在她的《回忆录》中也非常具体地提到此事。聂说：“一九六七年六月底（或七月初），北京大学的刘志菊到北京机械学院‘东方红’（地派），见到了许维纲，许维纲谈了对北京文化革命形势的分析，他的主要观点是：‘当前北京文化革命主要是总理派和文革小组派之间的矛盾。这一次你们北大站错了队，你们站在了总理一边’。”聂元梓认为地派许维纲的上述谈话反映当时天、地两派的本质分歧，但“不是所有单位、所有群众都明了。”“主要组织领导人是清楚的。”（注8）做为过来人，我认同聂的这一说法。当时，这就是我与牛辉林之间的根本分歧。但牛辉林并没有公开讲出他的观点，只是把聂元梓、“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做为“新的保守势力”、“老保”，进行打击。牛所说“公社”一派是“老保”，到底“保”谁了？牛没说出口而已。但这种根本分歧，“公社”与“井冈山”的大部分群众并不明了。

我毕业后，北大在1971年清查“5·16分子”时，“红旗飘”有几个人包括牛辉林被叫回学校接受审查。春节时，历史系领导张万仓老师突然到我北京家里找我。他想到春节时我会从外地回家。他让我到北大历史系给工农兵新学员和老师讲“5·16”的问题。我于是应邀到北大历史系给全系的工农兵新学员和老师讲了1967年6、7、8月北京市、北大极左思潮的表现，讲了“5·16分子”是三反，反新生的红色政权，反军，反周。讲了“红旗飘”成立不久，牛辉林是怎样分析形势的，讲了他们的秘密纲领就是反周。讲了我的消息来源。

我当时并不认为牛辉林、“红旗飘”是反革命，但他们的极左思想是绝对错误的。依我对当年“清查‘5·16’反革命集团”运动的观察，运动开始阶段是批极左思潮，后来发展成全国规模的“秋后算帐”，对文革初期的造反派群众进行清算。在中央上层，是毛、周联手进行清算。毛泽东打倒政敌刘、邓的目标已完成，造反派已无利用价值。周与毛在维护共产党的体制及其统治权上是高度一致的。毛泽东、周恩来为着重建经过改造了的党政领导系统，需要扫除障碍，打击对共产党政权不满的群众，于是便联手“秋后算帐”。真正的“5·16兵团”其实就是北京钢铁学院张建旗为首的十几个人，对此中央文革有调查员的

报告。可是全国竟然抓了300多万“5·16反革命分子”，是文革后期的一大冤案。
“5·16”问题是需要另设专题进行研究的问题。

1967年8月17日，“井、红、团、零、飘”五个组织联合，成立了“新北大井冈山兵团”，核心组成员有周培源、侯汉青、徐运朴、孔繁、杨克明、郭罗基、牛辉林、陈醒迈、靳枫毅等十一人。组长是周培源。后来陈伯达转达周恩来的意见，让周培源不要当群众组织的头头，组长改为牛辉林。1967年12月，周恩来委托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转告周培源：退出“井冈山”。北大“井冈山”提出的口号有：“‘井冈山’要在北大二次夺权！二次革命！”“砸烂校文革！”、“一切权力归‘井冈山’！”“摧毁老保‘新北大公社’！”我当时感到“井冈山”的这些口号，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很浓，且紧紧围绕着一个“权”字。开始时“井冈山”的头头是周培源，我颇感意外。他不是个科学家吗？他的时间、精力应该用在科学事业啊，怎么也卷进群众的派别斗争里来了？“井冈山”拿他当成政治家了。觉得不可思议。后来听说换成牛辉林当了第一把手，感到这详才是顺理成章了。为什么“井冈山”的第一把手没换为徐运朴、侯汉青或陈醒迈或郭罗基？而是牛辉林？我想根本的原因在于，在火热的阶级斗争大环境下，群众运动有个规律，越运动越激进，领头人也势必是越来越激进的人物，谁激进谁上台。牛辉林在“井冈山”最左、最激进，第一把交椅非他莫属。这种情形同样在“新北大公社”也出现过。到了1968年北大两派武斗时，孙蓬一对“公社”取得了绝对控制权，甚至有两个武斗指挥被火线提拔进入“公社”总部。而公社总部的李文因力主大联合、反对武斗，而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失去话语权。

15、7月10日陈伯达在大饭厅讲话及“二组”被砸

1967年7月10日凌晨3点陈伯达又一次来到北大的大饭厅，与群众讲话，煽动北大继续分裂、打派仗。就在这次会面将要结束时，在场的一个人（据说是“井冈山”的宣传部长）对陈伯达说：“我们北大有个二组，专整群众黑材料！”陈伯达立刻不假思索地回答：“那就让他们停止工作！”就是陈伯达这一句话，意味着新的打砸抢和揪斗就要开始了！7月10日天刚亮，有大批“井”、“飘”、“零”学生涌进保卫组，宣布：“根据伯达同志指示，保卫组停止工作，我们代表革命群众查封保卫组！”随后把保卫组人员全部赶走，由“井”、“飘”、“零”查封、接管了保卫组。紧接着“井”、“飘”、“零”用大字报宣布从二组查抄出大量北大师生的“黑材料”。由于当时保卫组有严格纪律，不参加学校运动，也不能受所谓“运动”的影响，也从没搞过什么师生的“黑材料”。“保卫组”在业务上受公安部和市公安局直接领导，负责治安工作。所以保卫组底气很足，向全校告示：保卫组从来没有搞过构陷学生、教师的“黑材料”，并强烈要求有关群众组织公布这些所谓“黑材料”的内容。这一告示发出后，“井”、“飘”、“零”铺天盖地的所谓“黑材料”风波戛然而止了。整个事件是以“莫须有”之名搞打、砸、抢、抄、封，破坏治安机构，践踏法制。而此事全是在“陈伯达指示”下发生的。陈伯达为什么对如此严肃的涉及治安机构的事情，不做调查就轻率表态？唯一解释是他唯恐北大乱得不够，因此抓住个由头就立马煽呼、挑事。（以上根据保卫组成员、法律系三年级学生蓝绍江：《我亲历的北大文革中的保卫组和‘7·10’事件》摘要，引自《华夏文摘》增刊第931期。）

16、陈伯达7月11日的接见

7月10日，校文革召开全校大会，布置工作，“井”、“飘”、“零”冲击会场，围攻聂元梓，殴打孙蓬一。同一时间，“井、飘、0”大规模打砸抢，抄、封了“二组”（学校保卫部），抢了机密档案；砸了“南阁”（哲学系办公室）。“66”和“联战”联合举行集会、游行，抗议“井、飘、零”打砸抢。“公社”保持了克制，只是和平示威，没有武斗。

7月11日傍晚，聂元梓带领校文革全体成员，去人大大会堂要求陈伯达接见，聂元梓让办事员通知我也去。我叫了黄虹坚一同去，以便有事好商量，我们俩人常在一起，比较谈得来。我感到，聂元梓此举是去找陈伯达“讨说法”，你“6·5讲话”，把北大搞成这样，“解铃还需系铃人”，你说怎么办吧？向陈施压，要他负起责任，解决北大问题。20来人到了人大大会堂，要求陈伯达接见。在一个会议室等了很长时间，约有一个小时。尔后，陈伯达在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陪同下来到会议室。陈伯达穿了件麻质短袖衫，敞着怀。聂元梓简单讲了北大的混乱情况，讲了前一天10号发生的打砸抢事件，问陈“怎么办？”陈伯达讲话有浓重的福建口音，不时停下来由傅崇碧给他翻译成普通话。陈说“几个人就是要跟你们北大一万人做对，有什么办法呢？”“人家知道不跳就活不下去。”“天塌不下来，大家回去睡觉，要学会睡觉。回去睡觉。”我听了陈伯达说的话，当时感觉较好。理解他的意思是，支持校文革，让反对派去表演，表演的越充分，暴露的越充分，垮的也就越快。他一再强调“要学会睡觉”，是让我们沉住气，静观其变。当时聂元梓还不肯走，似乎要静坐施压。我一看，这么僵下去不是办法，他是中央文革的组长呀，见好就收吧。于是站起来招呼大家“走吧，走吧”。傅崇碧也一再催促：“伯达同志讲了，叫你们回去睡觉。要学会睡觉。回去吧！”这样，大家就撤了。第二天，我在“66”的核心圈传达了陈伯达的讲话，大家对他的“要学会睡觉”之说，与我理解一样，很受鼓舞。

1967年3月以后，北京高校的一些组织（后来大多被称为地派）要打倒几个付总理谭震林、李先念、陈毅、李富春、余秋里，另外一派（后来大多被称为天派）则只“炮轰”，不“打倒”。当时北京高校出现了“炮轰派”和“打倒派”的分野。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也属“打倒派”。6、7月时有好多“66”的群众问我，对“二月逆流”的几个老总，“66”应采取什么态度？我一律回答“对几个副总理，我们‘一批二保’，他们有错误，可以批判，不能打倒！”我心里明镜似的，对几个副总理是“炮轰”还是“打倒”，实质是对周总理的保与反之争。“一批二保”的目的就是保周。

7月中旬，风闻武汉造反派“三钢”、“三新”与保守派“百万雄狮”对立。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支持“百万雄狮”。造反派反军区，反陈再道，两派斗争激烈，中央文革已去了武汉。7月20日发生了什么，我当时不知道。21日晚饭后，任珣琰找到我，说“中央文革王力在武汉表态支持‘三钢’、‘三新’，王力、谢富治被‘百万雄狮’扣了，后台是陈再道。一会儿在五四操场开声讨大会，给你个发言稿，你代表新北大去念吧。”他把写好的稿子给了我。开大会时，我上台念了讲稿，最后领着校内外几千群众高呼口号：“打倒陈大麻子！”

过了一天，7月23日，中央文革通知北大校文革，全校师生去西山，去京西宾馆示威游行。两派都去了。传说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开会，陈再道也在。路过京西宾馆，游行队伍的口号声比较响亮，我没看见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游行路上，听到某单位的大喇叭广播，“江青同志说，左派要‘文攻武卫’。”（后来流传陈毅讲，“江青一句‘文攻武卫’，天下大乱’。”）

7月25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群众大会，迎接王力、谢富治回京，声讨“7·20武汉反中央暴乱事件”。林彪出席并讲话。按中央文革和市委指示，北大两派都去了。“井、红、团、零、飘”在西校门外抢占接人去天安门的大卡车，不让“公社”的人上车。其实车辆足够，两派群众都去了。

我那段时间曾去清华看望于宁、方美琪这一对好友，他们对我说“现在不是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没劲！以后当逍遥派了。”

17、“66”、“联战”联合，重组“新北大公社”总部

大约是7月23日，聂元梓派办事员找到我，给了我一张她写的纸条，我记得纸条上写的是：“王复兴、索世晖：希望66串联会和联战尽快联合，重组新北大公社总部。可和卢平商量。聂元梓”第二天中文系的卢平找我，说“66”和“联战”联合，“公社”总部的人选方案，可以是4比3，“66”出4个，“联战”出3个；也可以5比4，你们5个，我们4个。你们“66”担任主要负责人。我当即说，你的方案我同意，但主要负责人不一定是“66”的。

大约在7月24日至26日，我召集“66”核心成员开会。我知道这帮人都不爱当头，于是讲了聂元梓的纸条，讲了和卢平协商的方案，然后一个一个动员“出山”。索世晖坚决不肯。金崇顺也不肯。沈永友很痛快答应了。李长啸第一天不同意，第二天同意了。索世晖推荐了刘存哲，介绍他在福建造反派中威望很高，大家同意。阎志胜找我，毛遂自荐，愿意进总部。我向大家介绍说，阎志胜在清华文革初期介入了清华运动，在蒯大富受压时，坚决支持他造王光美工作组的反，他当时对老蒯说，你造反，我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着你干！因此我常看到清华团派有人来北大找他。大家都同意他进总部。沈、李、刘、阎，这是4个人了，但他们谁都不愿当总部主要负责人，我也觉得没合适人选挂帅，于是提出“66”应再多推举1人进总部。索世晖说生物系六年级有个李文，他反工作组，工作组把他打成反动学生，他在学部的女朋友偏在这时候找他结婚，他老婆在学部是反吴传启的。李文介入了贵州文革，在贵州造反派中名气挺大。大家都觉得李文这人挺棒，应推他进总部。这样，“66”推举了5人进总部。

当时李长啸动员我也进公社总部，对我说：“没关系嘛，你也进总部吧。”他所说的“没关系”，我明白是指“家庭问题”没关系，不用顾虑。我当时已打定主意要退下来。前二天井冈山广播台还点名攻击我，说什么“喝美国牛奶长大的王复兴”如何、如何。王渊涛也听到这个广播，特意告诉我。我想，我如进了总部，“井冈山”准会拿我“家庭出身”说事，对我不利，还会影响“公社”，何必去当人家的靶子呢？我的历史任务完成了，立意要坚决退下来。

7月28日，改组、重建的“新北大公社”总部成立。核心组组长是孙月才，付组长是：卢平、沈永友，因孙月才常常去上海，实际主持总部工作的是卢平。核心组其他成员是：李文、李长啸、阎志胜、刘存哲、刘冲、曹芳广、黄元庄。

8月1日，重组后的“新北大公社”新总部向全校做了公布。同时，各系的“66”和“联战”的成员也联合，组成各系的战斗团。索世晖被推举为中文系战斗团团团长。历史系战斗团团团长是原“联战”的丁建华（后改名为丁建南）。

大约在8月2日左右，索世晖通过沈永友、李长啸向“公社”总部提议，由他和王复兴组建一个“作战部”，隶属于总部，负责文攻任务。总部批准，“作战部”办公室设在“总部”楼下。“作战部”由索世晖和我负责，其他成员有：扬子浪（谢定国）、陈双基、马西沙、张绍清、任瑚琏。总部经常与“作战部”联系的是李文，李文实际上是“作战部”的領導。8月的一天，聂元梓找索世晖，让他推荐一人代表她常驻“首都红代会”。索同我商量，他建议中文系三年级的马云龙，我觉得挺好，索向聂元梓做了推荐，聂元梓随后采纳。

（未完待续）

□ 原载王复兴：《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回忆录》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